

讲 座 集

陈兴强

通师专中文系编辑

二〇〇八年九月

[青年论坛]

0559072

现代社会与现代青年

现代社会，复杂纷繁；现代青年，内涵丰富。本次讲座，是在参加“云南先进文化论坛”系列讲座之后，尤其是听了云大金子强教授的《现代社会与现代人》和董云川教授的《教育管理者的素质》讲座之后，深受启发，尔后博采众家之长，以自己对人生，社会的思考来组织本次讲座的内容的，讲得不好，个人承担失败的责任；属于观点问题，容许讲后争论。先讲现代社会，然后讲现代青年。

什么是现代社会？简单地说，就是今天我们要面对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同以往大不相同的世界。

首先是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克隆技术的发展，太空领域的激烈竞争，以及人们对未知领域毫无疲倦的探索，都满足着人类的最大求知欲。就连我们争论了无数个世纪的“关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个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也在科学的面前迎刃而解。对高深的科学问题我没有能力解答，对一般的科学常识问题就从这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说起。这个谜流传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它已经成为那些无法回答的问题的代名词。实际上，我们只需对一些生物学问题稍加分析就能解开这个谜。人们普遍认为，在现代鸟类进化史的某一时刻，两只不太像鸡的动物进行了交配，然后产下了一个蛋，最后这个蛋便进化成了鸡。出现这个变化到底是因为在蛋孵化的早期阶段胚胎发生突变，还是所有的遗传物质都来自于上一代，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从定义上说，第一只鸡的上一代不能算是鸡，而它们生出了一个最终孵化成鸡的蛋。所以先出现的肯定是蛋。但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即一只不太像鸡的动物在成年之后发生了突变，突然变成了鸡，然后就开始产蛋了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便成年动物突然出现了基因突变的现象，形成了鸡的基因，但这也不会影响到它的骨骼结构。生物学家就是通过动物的骨骼来区分不同的物种的。唯一的可能就是这种动物产下了一枚鸡蛋，而不是这个物种的蛋。所以先出现的还是蛋。瞧，我们在语言文字上的争论不休的话题，一带入科技中就很容易分出是非曲直来。科技的发展，交通与通讯的进步，使我们的地球相对地缩小了，同时，地区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依赖却渐形重要，地球村的概念似乎在慢慢形成，而我们也一步步地走向“生活在没有国界的世界”的境界，因特网的发明及广泛应用就是一个例证。

在科技发展的同时，科学的理念正深入人心。人们对科学的信赖度越来越高，在这次发生的非典疫情中尤为具体。在大家对非典疫情尤为恐慌，无所适从的时候，与非典恶魔作生死决斗的科学院院士钟南山的解答，给我们吃了一剂定心丸，树立起了我们一定能够战胜非典的信心和决心。这也使我们不得不佩服科学家的头脑及他们在这些疾病流行之前高瞻远瞩的预见。比如 1998 年 5 月，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曾作过《面向 21 世纪的挑战》的演讲，其中有这样一段：“随着人类活动的国际化之后，还有一件值得大家关心的事，即世界各地不同的疾病可能很快地传染到全球各地。每天繁忙的飞机载满了旅客与货物飞越海洋与大陆到世界各地时，导致疾病的微生物、细菌与病毒也不可能局限于某些地区。况且我们还得记住，人类是无时无刻不与这些小东西的演化在竞争。从演化的观点看，有较长的生命周期的人类不一定占优势，微生物、细菌与病毒的生命周期往往是几个小时或几天，而且暴露在辐射或化合物环境下时，很可能引起突变。”非典疫情的发生印证了这些科学预见。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

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但同时我们也感受到，正因为科学的发展，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分离出这些病毒，知道了它的成因及变种，找到了有效检测和治疗的手段。目前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下，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正联合攻关，在药物的研究，尤其是疫苗的研发上夜以继日地进行，与非典疫情作时间上的赛跑，人类最终战胜非典的日子将很快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与人类的生活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了。

就拿比尔盖茨的家来说吧，这是一个智能化家的典范。长达 53 公里长的电缆全部被埋在地板下面，而地板是一个巨大的传感器：当有人走进房间时，地板会根据阳光的强度，来调节房间内的灯光亮度以及空气温度、湿度。其会议室可以随时高速接入互联网，24 小时为比尔盖茨提供一切他需要的信息，可随时召开网络视频会议。同时，这个房间的计算机还可以通过整个建筑物的传感器，自动记录整座住宅的动静。来访者必须佩戴专门的胸针，没了它，访客就会被系统确认为入侵者，电脑就会报警；来访者通过出口，就会产生个人信息，包括他的指纹等，这些信息会被作为来访资料储存在电脑中。进入会客大厅，最醒目的是墙壁上 40 平方英寸的背投式电视，盖茨在回家的途中，就可以通过智能住宅系统遥探家中的一切，包括让浴池的水自动调温，嘱咐厨房的工作人员准备晚饭等等。传感器还能对一棵百年老树的需水情况实现及时、全自动浇灌。在以前科幻小说里描写的场景，今已活生生出现在人们面前，而这一切，无不凝聚着科学家的心血，无不体现着科学的价值。

其次是知识的更新率和社会节奏加快。50 年代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在相应的一些时间段补充一些东西就可干完一生，即你所学的知识折旧率为一半；而现在七至八年内就需更新、补充，学电脑软件的更快，18 个月就要更新。计划经济时代，如果你是大学生，一毕业，你的分配方向，工作岗位，工资待遇就完全明确了。个人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和自主空间，但同时也就没有“待岗”之忧。而且一旦有了工作单位，就是一颗固定了的“螺丝钉”，大概要干到退休才划上“工龄”句号。如此，纵然工作岗位不甚满意，尽管生活不算很富裕，只要到了一个国营单位也就衣食无忧了。反正大家情况悬殊不很大，没太多攀比，心里也就容易平静安适。现在就大不相同，大学毕业，工作是双向选择，工作岗位也是五花八门，收入当然参差悬殊。我有一个侄女，天津工业大学毕业，学计算机专业的，去年毕业至今，已换了四个岗位，事业的、民营的，工资高的、工资低的，无一不试，据她讲，还没有找到自己中意的部门，还想再换。人们在有了极大的自主空间的同时，也要听从“市场”这只看不见大手的拨拉。市场经济是竞争的机制，是优胜劣汰的筛子，面对激烈的竞争，现代人既要迎接挑战，又要承受压力，现代人可不好做。

这就是社会节奏加快带来的变化。有人说，前现代社会，人们的“命运预测度”高：即自己一辈子怎么过日子，大体知道。比如农民，无非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偶尔赶街，则马街、牛街、羊街之类，按十二生肖的排序，十来天有一次规模不大的小额商品交换，“日中为市”，卖了柴禾或鸡蛋，换了食盐、针线等生活用品。年复一年，所变不多。儿子的生活是父亲生活的翻版，孙子的生活是儿子的摹本，变化极其缓慢。读书人的“命运预测度”亦同样高：极少数人“十年寒窗，一朝高中”，则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更多的人是“秀才落没，下乡教书”，做个“孩子王”打发生活。只有做官的“宦海沉浮”难以预测，这种难以预测更多的是不知升迁，不知死活，因为一不小心，脑袋就不在自己脖子上了。正因为这种“命运预测度”高，所以算命先生只需套套你的话，摸摸你的底，就能对你的命运做出判断，而且往往八九不离十。

成本增加，课税不变，私盐盛行，海盐侵入又加快了黑井的衰败。终于在 1933 年，云南盐运史张冲提出“移卤就煤”、“合煎并灶”的大胆设想，把云南黑井的卤水引到一平浪，用煤煎盐，降低成本，却遭到黑井灶户的强烈反对。他们出资请愿，请愿未遂，又策动暴乱，劫杀盐场场长，绑架县长，抢走巨额税款，事情干得惊天动地。很快，张冲的盐改失败，黑井衰败了。1955 年降格为一个建制区，1958 年三万多人的古镇只剩下 2600 个常住人口。黑井的标榜广告说明了这一切：

“感受百年前云南最富的弹丸小镇沧桑；

探索云南惟一的明清社会活化石；

透视历史尘埃下的云南明清贵妇；

体味上个世纪中国黑盐的兴衰荣辱。”

现代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信息极灵通。电视机、BP 机、大哥大、越洋电话、因特网、地球变小了，也使人们对自身的认识有了许多参照体系。犹记得 80 年代开放初期，从法国打电话到中国，必须通过接线员，首先挂号，然后守着电话等“点名”，一等往往两三个小时，如果对方占线，又得从头轮起，好不容易试通了，却搭错了线，听筒传来一把大嗓子：“喂，人民法院，找谁！”现在打电话到中国，接线时间往往比本土更快，一拨完号码便接通，声音清晰，失真率低，仿佛对方就在眼前，一万多公里的空间完全消失了。私人交往是如此，日常生活也是如此。互联网，把各行各业送上门来，足不出户，可以办妥很多事情，缴交水电费和税项、银行转账、买卖股票，或者订购书籍、衣服、食品，向专家请教，与名人讨论。十只手指加一个键盘，把整个城市搬到面前。20 世纪除了时间愈来愈快，空间则愈缩愈窄。公路网、铁路网、海运网，无远弗届，24 小时，可抵达世界任何角落；电话、传真、无线电话和互联网的普及，拉近了人的距离，天涯若比邻。而这些变化不过是最近四五十年，尤其最近十年。但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同时，域外的发展、世界的进步，都成为对我们的逼压。“落后就要挨打”的箴言足以使每一个有血性的现代人不敢不勤奋，也不敢使自己在奋进的途中停下，真有一种终日乾乾的紧迫感。

以上的这些变化必然带来了以下的三种情况：

一是现代社会的压力增大，精神疾病问题突出。以往的社会尤其是农耕时代，春耕秋收，一年是一个生产周期。生产节奏慢，生活节奏和心理节奏也慢。现代社会，以时、分、秒为产品生产周期，人们的生活节奏和心理节奏大大加快。工作竞争激烈，生活紧张繁忙。有人作过比较，新一辈昆明人比老一辈昆明人说话速度快、走路频率快、睡眠时间少、精神压力大。常言说，年轻不年轻，关键看眼睛。有人说，昆明人平均每一分钟比上海人少转一圈半眼睛。眼睛转得快，说明脑袋转得也快。但上海 1300 万人口中有精神疾患人数 75 万以上；广州去年的统计是 60 余万。上海的大学生中，精神疾患患者的发病率高达 25%。这种情况在都市中有普遍性，在国外有过之而不及。法国人是讲究享受的保守民族，他们设计的一种家具可以连电视机、音响组合都藏起来。面对 20 世纪的剧烈变动，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他们没有美国人的垦荒精神，又必须面对国外竞争，加之失业黑云压城，内外受敌，有些人招架不住，精神变态，心理学家发现社会恐惧症正在蔓延。症状因人而异，最典型是“车站恐惧症”，无论上班或出差，一走进车站便浑身不自在，心脏加速，额头流汗，两手冰冷，火车关门那一刹，甚至有人感到刀切般的腹部剧痛；另一种表现是自怨自艾，“外貌不如人，能力不如人，”担心明天不能保住今天的工作饭碗——不断责怪自己无能，到了

但现代社会不同，“命运预测度”极低，所谓“三年河东，四年河西”。别说儿子、孙子怎么过日子，就是自己怎么过日子也难以预测。就拿我来说吧，侥幸躲过了当知青的命运，暗想考不起大学就去商业部门站柜台；却又考上了师专，心想这下一辈子要和孩子打交道了；毕业分配，学校推荐分中级人民法院，却不知为何原因留了校；原想继承恩师的衣钵教心理学或教育学，却被当时的李力校长一句话，便到行政部门工作至今，先后在政治处、团委、校办、基础部工作过，并兼任过地直团委的副书记，曾任行署曹付专员办公室下面的经贸科长。干了两月，还是觉得学校思想和行为相对自由，又当了一回“逃兵”。到如今，我学的专业是中文专业，钻研的是演讲理论与实践。1982年到昆明参加首届大学生演讲大赛，站在南屏街上，心里唯一的愿望就是想拥有这一地段的一套住房，殊不知，20年后，因媳妇调动，果真在这里得到了一套住房。今后将怎样生活，我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工作可能时时发生变化。所以说，现代人机遇不断，“跳槽”已经不带贬意，能人总是敢于频频择业的。他们说：什么叫投机？就是人力与物力资本投之于机会；什么叫危机？就是没有危险就没有机会。这当然是现代意识。但判别机会、捕捉机遇、拼搏风险、挑战命运，哪一样是轻松的？有哪一样是可以事先预测的？命运的预测度低，就需要每个人不断进取、不断学习、不断开拓。做一个现代人，够累。

以往的社会，是相对封闭的社会。鸦片战争以前，据专家考证，中国人到过欧洲并留下文字记录的人不过三人：一个是元代的维吾尔族人巴琐马，另两个是清初的樊守义和谢清高。辛亥革命前，云南人到欧洲留学的也仅有三人，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云南官派或私人出洋留学的也不过百人而已。信息不灵、闭塞窒闷当然不好，但也有一个“好处”，可以关起门来夜郎自大、盲目虚骄，虽说是孤芳自赏，顾影自怜，但在这种阿Q精神下，心理压力倒不是很大，但结果却是严重的。我们云南有一个产盐的古镇叫黑井，因产盐而富甲一方，元朝，“（黑井）弹丸耳。而课额则当云南地丁之半。”明朝，占云南总税赋的67%；清朝，占云南总税赋的50%；清末民国初年，占云南总税赋的46%。黑井曾经是县制。黑井的富，可集中体现在武家大院。按照富人居僻静处，普通人居闹市的生活习惯，这个大院高傲地坐落在一排排商铺的后面。据说大院建得过于豪华、张扬，大有盖住县衙门之气势，官家只得特定一条很无理的规定，不准武家大院将大门开在正街，楼也不准高于三层。武家动了些脑筋，干脆朝北侧向开门，与不远处的文庙相互呼应，纳一股祥和之气，承一袭儒学之风，不动声占了个大便宜。该大院是土木结构，布局严密，风格流畅。道光十六年（1837年）动工，至咸丰七年（1858年）扩建完工，历时21年。雕琢费心思。建筑依山而上，屋子依地势又建为三层，上下两个四合院共同构成一个外人轻易看不出的“王”字，把主人武维扬“黑井第一灶户”的霸气永远地保留了下来。我印象最深的是武家大院的三重门，正门轻易不开；武家的会客厅绝对与武家财富对不上号，但却透着商人的精明；武家大院里摆着用整块砂石凿成的浴盆，任时光为它涂上一层层斑驳的苔痕，却也显露出武家对时尚的追求……古寺、古塔、古屋，这一切都表明黑井人最有资格随时像阿Q一样理志气壮的自豪一回的。“我祖上曾经阔过。”可不是吗，在民国晚些时候，黑井人已经拥有了好几辆私车；还有人买来了手摇式的电话机，把走马转角的每一个地方都装上了西洋嘴巴，“喂！”“喂！”“HELLO！HELLO！”但在浮华的后面，隐藏着极大的危机。黑井最繁华的时候，居住着三万多人，每年煎盐5000吨，但与此相伴的却是另一组可怕的数字：煎一斤盐要消耗三斤柴，每人每天生活用柴还需要半斤左右，每年二万吨的柴，再加上上千年的煎盐时间，黑井一个小镇，“可怜乔木尽，不使好莺啼。”柴薪昂贵，

最后，心如刀割，五内焚烧。这些人害怕多变的社会，千方百计避开令人恐惧的地方，车站、飞机场、超级市场、高速公路……有些人不敢搭乘电梯，无法在指定的停车位置放好车。到最后，甚至有人除了上班以外，干脆足不出户，只通过电视和互联网窥视不友好的世界。说来难以令人置信，患者多数为行政人员，高等学历，在企业任要职，在他们潇洒的外表下面，原来藏着一颗脆弱的灵魂。在日本，由于经济、社会、家庭、企业的压力巨大，每年自杀的人数超过3万。今年2月11日，就有3名日本人通过互联网集体自杀。专家认为，从疾病发现史来看，人类已经从“传染疾病时代”、“躯体疾病时代”进入“精神疾病时代”。现代人看起来潇洒，可做现代人并不容易。

二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喻、并喻、后喻有显著变化。长时间以来，我们是处于“前喻”社会：就是前辈教导后辈、年龄大的教诲年龄小的、胡子长的傲视胡子短的。因此“以孝治天下”曾经是美谈。现代社会，有人说“并喻”社会渐成事实：就是同辈人互相切磋、互相砥砺、互相学习、互相促进。谁忽视了这一点，谁就难以进步。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趋势使“并喻”势在必行，甚至，现在已经出现了“后喻”社会的端倪：就是后生启迪长者，年轻人胜过老年人。因为年轻人接受新知识快，在“知识爆炸”，知识更新极快的今天，他们占有知识接收与转化快捷的不争的优势。今天任何年龄段的人，都不得不对同代人乃至后辈人的严峻挑战，在“择优劣汰”的法则面前，没人敢松懈怠滞，否则便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前年刚42岁就放出风说要退休，去年就放弃了一个主要职位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认为自己确实老了，领导微软帝国已力不从心。他说：“电脑软件是个迅速发展的产业，充满危险和风险，无法想象一个50岁的人——不管是我还是其他什么人，能担当起领导微软公司的重任”他说的是实话，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网络时代，盖茨到了这个年龄才想退休已经是相当保守了。在一些新的经济前沿的行业里，35岁就该退休了，一到30岁就有了恐慌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歇菜，或被扔出去。《读者文摘》援引一位银行职员的话说：“这么多的新投资突然放在了高科技上，而高科技是建筑在熟练的技术上。今天的技术只能今天教，不是3年前教的。经验一文不值，它只意味着你的技术已经老了。在高科技时代，甚至在25岁离开学校4年，你的技术已经老了4年。如果你在硅谷，25岁最好已经挣到了钱，因为你已经完了。我27岁在这个行业干了7年，已经是一条恐龙了。”这些站在新时代潮头的白领和金领阶层，一个个都赚了大钱，尚且整日活得紧张兮兮，落伍得如此快捷，那些活得更为艰难的普通人岂不要精神错乱，老得更快吗？所以，做个合格的现代人，一点都不轻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高尚，也是辛苦与劳累。

三是人才类型要求发生变化，需要综合型人才。在我们的词汇中，有许多关于人类的称呼，如人口、人力、人才、人精、人渣。如果非要给人才下个定义，那就是相对的非可替代性的人就是人才，说到底就是有自己特色的，专、精、深的人。人才有以下类型：“一”型人才，像螺丝钉一样，钉到哪儿都可以，但不是最好的，拿不了冠军，充其量是亚军、季军；“1”型人才，有本事，很有才干，有专深度，在某一方面就是专家，唯一的，但相关知识不够，一旦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必遭“择优劣汰”；“T”型人才，知识与能力又宽广，又精深的人才，是现代社会比较突出的佼佼者。但仅有这些还不够，现代社会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需要“十”型人才，既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敢于冒尖的，有创新精神的，这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现在人们又提出了“土”型人才，这底下的一横指人的素质、人格、人的品行。曾有一个北大的硕士，到美国读博士，个性太偏激，什么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别人都不如他。当导师没有推荐他担任

一个项目的负责人时，便认为是同学搞他，导师整他，于是杀了同学，导师，最后自杀。在去、前年的人才交易市场，有的招工企业打出了“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免谈”，问其原因，均回答这些大学前来应聘的毕业生大都好高骛远，一来就讲待遇要多高多高，自己的要求有多少多少，这种不合作与鹤立鸡群的毕业生自然不受欢迎。我个人认为，这个“土”型人才的上面还应该加上一横，变成“王”即综合型人才。这一横代表的是口才。现代社会的人才还应该具备口才。邵守义老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人才未必有口才，有口才的人一定是人才”，何谓口才，是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有文的口才，而非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那种口才，也不是咱们四川的摆龙门阵，也非东北的瞎掰活，更不是北京的侃大山。侯宝林曾对邵老先生说：“相声演员没有一个笨蛋。”细琢磨，是啊，你们说，笨蛋能说相声吗？你瞧瞧说相声的那帮家伙，反应那个敏捷，嘴皮那个利索。人才未必有口才，陈景润没有口才，你能说他不是人才？茅盾先生没有口才，你能说他不是人才。但有了口才的人才，就如虎添翼，一飞冲天。鲁迅先生的口才跟他的文才一样有名，他的思想、他的创作在演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传播。你说，蔡朝东是不是一个人才？我认为。论学历，不过大专学历；论演讲，却是人们公认的演讲家。景克宁教授评论他的演讲：“有使人豁然开朗的见解，有黄钟大吕式的哲理名言，有栩栩如生的描绘，有谐趣横生的插曲，有飞翔如翼的引喻，有优美真实的思想感情。在听他的演讲时，我曾从他架设的理解之桥走向广阔的生活。丰富的人生，需要开阔的视野，心灵的沟通，需要可纳百川的胸怀。在听蔡朝东的演讲中，我走进了小草如茵的普通人行列，走进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同思考，共享乐。”所以说：“四个万岁”的报告使蔡老师走进了演讲家的行列，也成为我们云南不可多得的人才之一。现代社会里的人，要具备各种各样的能力，还要具备宣讲自己理论与能力的口才，做个人才真是不容易啊。

因此，现代社会并不只是高楼栉比、公路平直、饮食甘美、服装时髦，并不只是丰厚的物质与快捷的网络。现代社会充满了竞争拼搏、遴选淘汰、压力挫折、失意悲哀。因此，现代的人常常不免大大地有失落感。

失落使人茫然，但失落往往是进步的前奏。有识之士指出，人类社会就是在失落中反思后奋起：1840年以后，在“茫茫福州叹陆沉，救国无计愧偷生”的失落中，终于奋起并历经探索，认识到“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最后使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厄运。1976年以后，中国人从“文化大革命”幻化的“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自诩中惊醒，心里失落之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迈开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步伐，终于用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谱写出人类进步的新乐章。现代社会，我们要正视它经常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失落，“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只要以正常的心态看待失落，就有可能驾驭失落而寻得新的生机。

以上对现代社会作了一个探视。下面想谈谈“现代青年”。

首先，青年是一个年龄界限。在古代每一个年龄段干什么是有规定的，《礼记》上说：“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按照这个标准，20岁至30岁这个年龄段的谓之青年。按照我们退团的标准是28岁，18岁至28岁之间的也是青年的一种标准。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人类寿命的延长，从18岁到35岁或者再延至45岁的也都可称作青年。在社会学的视野中，“青年”不仅是指处于青春期年龄阶段的人，

它主要是指一个社会地、历史地形成的社会类别。这个类别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期会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从这出发，“青年”应视为一种由青年人担当的社会角色，将其定义为一种角色类别。在中国，“青年”这一角色类别最早形成于近代教育制度成立之后。既而在年轻人与社会的互动中，从20世纪初的“少年”、“新青年”一直到八九十年代的“民主青年”、“现代青年”，“青年”角色类别由其成立而至最终解体，其意义不断演变。实际生活中，作为现代意义上的青年，决不是一个年龄界限能划分了的。有人正值青春，就已经害怕挑战、害怕挫折、害怕艰辛、害怕风险，那么他算不得是“现代青年”；反之，有的人年事不轻，却有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志向，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韧性与斗志，有“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品格，那么他仍是货真价实的“现代青年”。其次，现代青年不是某一种单一规格的标准品，如“征婚广告”标示的要求那样，诸如身高1.78米以上，身体健壮，面貌英俊，有住房……或者诸如身体苗条修长、面容姣好、性情温柔、显年轻……更不是有人形容30岁已婚男人的生活状态：“世界大着呢，孩子小着呢，事情多着呢，钞票少着呢，别人笑着呢，老婆骂着呢，日子长着呢，俺正忙着呢。”所以，心理的年轻才是最重要的。

“现代青年”应当是分层次的：达到某一个层次，是及格的现代青年；达到某一个层次是良好的现代青年、高分段的现代青年、甚至是优秀的现代青年。这里提出几个层次，让我们来共同切磋。

一、角色人。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为“可变的伦理角色”。达乎此，算是一个及格的现代青年。一为“不变的人格角色”。达乎此，可称是一个高分数段的现代青年。

可变的伦理角色：指人在不同的环境、场景中，其行为规范与言谈举止的要求并不相同。比如说我，就是我，但我得时时转换角色。我在我女儿面前是老爸，就可以神气活现地“庭前训女”，但在我爸面前是个儿子，我就得收敛恭顺地聆听教诲；我在学生面前是老师，就须为人师表，诲人不倦；我在我的老师面前是学生，就必须虚心恭谨、笃学慎思。不能错位，否则就贻笑于人。比如我可以摸着女儿的头像：乖女儿，真乖。而我绝不能摸着老爸的头说：“乖爸，你真乖”。除非是喝醉了酒说昏话。同样，如果你是演员，演楚霸王，往台上一站，“力拔山兮气盖世”，一派英雄模样，这是舞台角色的定位。倘若你下了戏台，回到家还端着一副西楚霸王的架子，家里的“领导”就觉得你一定是犯了精神病，闹不好还会姬别霸王——老婆跟你离婚了事。我有一个同学，在市委某部任办公室主任，在办公室指挥惯了，回家仍是一副领导派头，指挥妻子干这干那，妻子不干了，说，回家了，你是领导，还是丈夫？角色错位，只有离婚是“无言的结局”。因此，搞准你的角色定位，十分重要。

被鲁迅称为“灵魂的拷问者”的俄罗斯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句世界名言“你知道——你是谁吗？”这句话在一个大家可能永远都不会去的地方——劳改队特别管用，这儿有个“三句箴言”的标准，给“角色定位”作了一个简明的定义，写得妙极：第一句，你是谁？第二句，这是什么地方？第三句：你到这里干什么？回答是“我是劳改犯。这是劳改队。我是改造自己来了。”如此，我们在任何场合都按这三句话来寻思自己的行为，那么就可以算是懂得了“可变的伦理角色”的真谛。比如：你是谁？我是学生。这是什么地方？昭通师专。你来这里干什么？学习来了。有了这些，你就知道到昭通师专不是来吃喝玩乐的，不是来交男女朋友谈恋爱的，更不是打打杀杀做混世魔王的。在座诸君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你在家可以睡睡懒觉、耍耍小脾气，由于“四二一综合症”存在，任性一点也就被父母等人包容原谅了，这是你

在家庭中“独生子女”的角色。但是在学校或者工作单位，这里只有领导与员工、教师与学生的角色，你如果不懂角色与相应规范的转变，依然摆出一副“独生子女”的优越架式，可以断定，领导将不会赏识你，同学、同事也不会欢迎你。角色变换就如水形变化：水就是水， H_2O ；但水从黄土高原流下，就变成滚滚的浊流；水从唐古拉山下来，就成为清澈的长江；水到了虎跳峡，就汹涌澎湃气势逼人；水到了宽阔的武汉江面就舒缓平和。水都要因势象形，各具形态，为人处世焉能不思考角色转换。

但角色无论如何转换，男女角色不能更换，否则就是角色异常，有心理健康的问题，严重的甚至需要通过手术，并且通过大量的心理治疗，才能适应新的角色。我曾经在一次演讲点评上讲过一个比喻。我说男生是大拇指，女生是小指头。下面的女生一片哗然，其中不少人怒形于色。我说，且慢，诸位，大拇指代表粗壮结实，稳得像铁塔，小指头代表纤细娇小，柔得像流水，请问，有哪一位女生愿意由小指头换成大拇指？

个人的角色表现往往也会成为群体形象的代表。一位先生出国，他在异域的行为举止不仅代表他自身的角色形象，还代表着中国形象，他也许就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人的一个具体范本。这里个人角色有了民族与国家角色的意味。同样，你作为昭通师专的学生，修养好、气质好，在校外尽做好事，在别人眼里，你就成了昭通师专整体形象的代表。角色认定与角色规范不是个小问题。

不变的人格角色：角色的“变”是为了适应外在的环境要求，人格的“不变”是体现人的内在的境界。什么不变呢？理想、追求、永恒意义的价值理念，应当有恒定性，不变性。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否则与猪有什么区别？在历史长河中，有些喧嚣一时的豪族高官，在时间的筛选淘洗下后来都悄无声息了，反而是那些毫不显赫的乐师、画匠、诗人、文士等连同他们的作品，在历史时光的打磨下，历时愈久越有光彩，这里透露了人类具有追求恒久的终极性的趋向。

不变的人格是荷花的品格：“出污泥而不染”。环境的污浊决不会改变荷花亭亭玉立、不妖不曼的君子风范。也就如孟子提出的人格境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对人也是一种考验，有的人可以同患难，不能共安乐，也许就是经不住“富”的考验。有的人“贵易友，富易妻”，恐怕是耐不住“贵”的炙烤。古人云“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除了对人生浮沉的感情承诺之外，也包含了对恒久精神的向往。而“贫贱不能移”也谈何容易，两袖清风，囊空如洗而能洁身自好、志向高远，哪是凡夫俗子能想象的。不是说：“饥寒起盗心”，常言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吗？但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做一个“安贫乐道”之人，也是一种价值吧。“威武不能屈”更非易事。对权势者的压力，物欲的诱惑力能一腔正气强劲挺住，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倔强去做人，难矣哉！

难，但也总是有人能做到。举一个例子，即翻译并传唱《国际歌》的瞿秋白。青年时代的瞿秋白，他的志向不过是做一名报人及学者，他也很多才多艺。如果从文，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绝不逊色于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因为他早在大学讲课的时候，丁玲就扑闪着两只美丽大眼睛站在台下聆听；如果潜心翻译工作，以当时在国内数一数二的俄文水平，不愁成不了大家。鲁迅就说，由秋白翻译《死魂灵》最为相宜；如果不闹什么革命，他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还会成为著名的金石家、书法家或成就为一代名医，从而过上那个年代人人羡慕的舒适生活。可是，他没有。他有的是，当看到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为救万民于水火而踏上寻求真理的道路；他有的是，当目睹党濒临灭顶，敢以一副柔弱的书生

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怒吼；即便被自己人打倒，仍不改初衷，他有的是，从被捕到就义，从容不迫，视死如归的英勇。记得临刑前，他唱着《国际歌》，泰然走向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面对敌人的枪口，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而后舍生取义。

我是含着热泪看梁衡的散文《觅渡，觅渡，渡何处？》的，在所有纪念瞿秋白的文章中，这是最能体现秋白的思想脉络和他对党对国家的赤子之心的。可以说，梁衡笔下的瞿秋白是真正做到了孟夫子的三句话的。他是真君子，真男儿，真正的共产党人。

也许有人会说，这都是以前血与火时代的人物了，现在是讲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利益原则的时代，信仰啊、人格魅力啊，似乎都不吃香了。我以为大大的不然。云大成教学院有一个叫石鹏飞的教授，我虽未亲自聆听过他的讲座，但看过他的《女人的发现》，《人生观与人死观》讲座的书稿，对其魅力十分敬仰。也听说他是一个傲岸不羁，极富个性的人。据金子强教授讲，前年暑假，他带领集中面授的函授学员到昆明黑龙潭公园休闲。凉风习习，薄暮冥冥，同学言笑晏晏，忽见这位才高心傲的先生对着几块墓碑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谁的墓碑？原来是中共地下党云南省委最早牺牲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的墓碑。有学员开玩笑：先生您是民盟成员，怎么向共产党员王德三、吴澄^{（注）}：吴澄，女，1925年考入东陆大学（云大前身）文科预科班，成为云南最早跻身于高等院校的女性之一，1926年8月加入中共，为云南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同年11月云南成立中共特别支部，其为特支书记。27年7月，任云南特委妇女委员；30年冬，因叛徒出卖，与其夫李国柱（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委员，团省委书记）一道被捕。30年12月31日，吴澄夫妇同被捕的中共云南临时省委书记王德三一道壮丽牺牲。等人的墓碑如此肃穆地行礼？先生正色曰：我是为真信仰，真理想者鞠躬，这些人是有真信仰的，并且为自己的信仰和理想献上了生命，就冲这个，别说鞠三个躬，就是叩三个头也应当。言毕，所有学员，有的是公安干部，有的是中学教师，都自发地肃立向烈士墓碑三鞠躬——一鞠躬，为真信仰；二鞠躬，为真理想；三鞠躬，为真人格。我想，如果你有信仰、理想、人格，那么有德行的人就会对你充满钦佩和敬意。人格自有它璀璨的光辉，矢志不变的正义与高尚人格，他那沉甸甸的价值，不是金钱能买到的。

二、经济人。什么叫“经济人？”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都认为人就其本质来讲是经济人，所谓经济人，就是自觉地追求效应最大化。

动物也追求效应最大化，比如丢一块骨头给狗，狗绝不会绕“S”型拐弯抹角而来，而一定是直线奔来，距离运筹效应最大化。但动物是自发地追求效应最大化，人却是自觉地追求效应最大化。人们投资炒股，是追求经济效应最大化；交费读书提高文化与全面素质，是追求日后成就与贡献的效益最大化；择偶结婚是追求协同和谐、互相提携生活幸福的效应最大化；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是追求荫庇子孙，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优化效应最大化。效应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社会的、文化的；效应可以是投入于此产出于此的，也可以是投之于彼产于此的，甚至可以是个人投入惠及大众的。普罗米修斯窃火、徐虎下班后的辛勤工作等不就是例子吗？舍身取义、舍己为人等人生境界不就是体现“经济人”的本质精神吗？

生活中，效应最大化的借助手段是“全力以赴效应”。好比鼓掌时，抬起手臂，挥动双掌，如果左右手只各伸出一个指头，那么发声便很小；各两个指头，声音稍增大；依次增加至两个巴掌拍击，声音最大。让我们全体起点，一起来做这个游戏好吗？大家感受到了吧。最后我们听到的是震耳欲聋的掌声。就是说

只有全力以赴地运作，才能在同等投入中取得最大效应。

学生们说，学校中只有两种教师，一种是“死去的教师”，一种是“活着的教师”。学生还未毕业，就把

曾上过课的老师的姓名都忘记了，说明所上的课程根本没有给学生留下任何深刻印象，讲课的老师在学生心中只是一抹幽灵般淡漠，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确是“死了”。所谓活着的教师，就是学生毕业许多年后，教师讲课的音容笑貌、要言妙道、警句奇语仍然历历在目，清晰地镌刻在心中。这种教师即使肉体死了，但生命的灵光犹存。即便是这样的教师已过世多年，他们的人品，他们的教诲仍镌刻在学生心中。最新一期由我校四个文学社联合主办的《守望者》小报登了两篇文章，很值得一读，并值得人深思。一篇是雷平阳的“关于《野草》”，其中一段写得情真意切：“昭通师专让我从一个农家子弟‘蜕变’为功利主义者眼中的一个国家干部。在就学的两年时间里，让我有机会聆听严斯信、卢开镰、钟玉芬、高然其、李雨丰、章皆淳、陈孝宁、周天忠、黄吉昌、邓天玲、杨家柱、宋家宏、朱安义和吕崇龄等诸位先生的教诲。当时作为一个17岁的少年，他们之于我，是导师也是神灵，他们教给我知识，我一生都受用不尽。从这个意义上讲，昭通师专在把我变成‘国家干部’的同时，给了我足够的生命的意志和力量，使我在之后的时光中不至于满眼苍茫。也可以这么讲，是昭通师专为我提供了梦想的原材料和行走的勇气。”这段话我不仅赞成，而且举双手赞成，也使我对今天的中文系的学友们产生了怜悯。你们太不幸了，你们没有听过如此博采众长，神采飞扬，汪洋恣肆，颇有大家风范的老师们的课。你们见过端张椅子，反手在黑板上写英文，声音细得象蚊子，非叫你耸起耳朵听讲的严斯信老师吗，他教给你的绝非只是知识，而是研究的方法；你见过在广东出生、成长在广东，却又讲得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卢开镰老师吗，他用广东话、昭通话、普通话朗诵的宋家宏教师的《远航》而今犹在耳旁回响，并铸就了我搞演讲、朗诵的理想。还有教过我《心理学》的老师舒瑞珍，她也是我实习时的指导教师。2001年的某一天遇到我，谈起了一件事让我感动不已。她说，“我孙子在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时，对怎样阅读好课文感到难度很大。于是我拿出你实习时朗读这篇课文的录音放给他听，他听得十分入迷。听完后很奇怪这么多年了我还保存着这盘磁带。”吃惊的不仅仅只是她的孙子，更吃惊的是我。忽然间，老师在辅导我写教案、上讲台、用教具、当班主任、布置作业等上的悉心教诲的情景浮现在我眼前，而这一切已过去了差不多20年。20年是一个不短的岁月，是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分界线。20年间有许多变化，即使是我的老师已是古稀之年，并且几年前因患癌症动了大手术，但精神仍然那么好，每每遇到我，总要说一些开心事，让我们这些做学生的释怀。我试着问自己的心灵，在以后的教育实践中，你做到了老师要求你应做的吗？老师对教育的精益求精，尽心尽责，对学生的悉心指导，宛如对自己的孩子，不，比对自己的孩子更上心的为人师表，是不是在我们身上得到了传递。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中，是不是有着先生们的人格魅力于我们心中留下的不灭的投影呢？可惜限于时间我不能一把这些老师的光辉展现在大家面前，但他们就像一盏盏黑夜中的明灯照亮了摸索中的我们，给我们带来的是终身的影响。这里，我还想讲一下我们的老校长——李力。雷平阳写道：“在我少年的心目中，当时的校长李力，他既让我感到敬畏，又让我感到亲切。作为野草的顾问，他虽然无暇对‘野草’的事情一一过问，但他时刻关注着‘野草’，每次去向他申请办刊经费，他都一一满足。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听说我的家在乡下，很穷，他还让图书馆的领导把我安排在图书馆搞‘勤工俭学’”。李校长就是这样的人。记得我留

校后分到政治处，刚好遇上学生干部培训，我无意识地带了一本杂志，听到无聊处便拿出来随意翻了一下，校长见到后，当着学生的面就是一顿批评，让我下不了台面。可就一次批评，就让我记住，也使我在任何再怎么无趣的场合也要‘慎独’。正是有了这些，我工作十分努力，毕业第二年我刚20岁校提拔为全国高校中最年轻的团委副书记。也就在这一年，李校长奉调到昆升任云南民族学院院长。一次暑假，我和现任昭通报社副总编的梁思洪去拜访他。他十分热情，留我们吃饭，与我们摆谈，如一个长者，全无院长架子。听说我们要回昭，便盛邀我们同行。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从司机嘴里得知，他是回昭看老母亲，并且因为我们把小卧车换成了旅行车。非常令人痛心的是，李力校长英年早逝，但他火化后仍魂归故里，墓就在洒渔巡龙的一处山坳里。几年后，他的夫人前来扫墓，我也利用我的职务之使，派车并陪同她前往。在他的墓碑前，往事如流烟一样飘过，内心的敬仰都寄托在我深深的叩首中。

另一篇是王正洪同学怀念唐启耀老师的《桃花挽歌》，开篇就迷漫着一种思念和感伤：“告别初恋，是在春天的一个夜晚，师专校园那一径桃花，红得刻骨铭心。没想到许多年后，又在桃花灿烂的季节，告别了启耀老师。没能赶上去看他最后一眼，也没能在他灵前捧花一束，得到消息时，已是四月中旬的一个黄昏，细雨敲窗，乍暖还寒，唯有楼下的桃花依旧盛开。我木然许久，生命不可捉摸，如同此时飘落的雨点，花瓣上的水珠儿，点点是离人泪。”启耀老师是为了寻找爱情而到昭通的，被爱情抛弃，自己却割舍不下昭通，留在了昭通。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另类的教师，他的上课方式几乎在中文系差点酿成一个危机，他是教《古代文学》的，研究的却是世界军事，订的是《军事历史》、《世界兵器》、藏的是《二十四史》、《世界兵法》。现在想来，我和他廖廖几次的交谈除对他的生活的习惯给予关注外，就是对他的军事研究不理解的询问。而从当今发生的伊拉克战争来看，启耀老师当为最为聪明者，从战争看国际争端，从战争探人间是非，从战争排国际秩序，从战争找规律方法。他的逝去，使我们少了一个伊拉克战争现场评说。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他存在的意义在于使我们的大学校园多元化，在于使我们的大学校园丰富化，从而提高着大学的品味，铸造着大学的思想，所以，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无大师断不能享大学之名。教师不治学，学生何以好学；师不识企业，何以教企业之学；不解社会，何以传搏击社会之术。一句话，教师地位要靠心血铸成，不能坐享其成，无真才实学者，不必奢望来自学生、同行、学校及社会的尊重。

上面所述都是活在我们心中的教师，他们都体现了教学效应的优化运作，不过是，有的在教学，有的在品质，有的在研究。当然，同样是教书，你讲了两个小时，讲得口吐莲花、字字珠玑、动人心扉；我也讲两个小时，讲得平淡枯燥、语言乏味、味同嚼蜡、听者厌厌。那么，你符合现代经济人的原则，而我称算不得合格的经济人。我们都投入了生命中的两个小时，但产生的效应却大相径庭。再如，同样在公共汽车上售票，每天工作都是八小时，结果你成了劳动模范李素丽，而我只是应付工作混日子；同样听课两个小时，你专心致志，举一反三，慧心大开；而我心有旁骛，“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而射之”，全无收获。生命时段投入是一样的，而在“全力以赴”上投放有别，由此在效益产生上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学习效益产生上一——判若天渊。做工人、当农民、为教师、作学生、当干部、做商人——都应该“全力以赴”，以同等的或较小的投入产生相对大的效益、效应，思考“经济人”的真谛，以实现效应最大化。

三、文化人。文化人与文凭并不全然划等号，文凭不过是文化的一个标识符号。生活中，学衔不低而

举止粗野，颇少教养的人并不罕见。有真才实学而学位不高的不乏其例。

陈寅恪先生在国外留学多年懂十几种文字，连梵文乃至吐火罗文的造诣都极高，却没有一一去拿硕士、博士文凭。回国后，清华大学的主事者以陈先生学位不高而不想延聘其执教，清华大学教授梁启超大怒道：陈先生无文凭但有水平，我梁某人亦算著作等身了，但有时十数万言的一本书，未必就高过陈先生千把字一篇论文的见证。后来清华大学聘用了陈寅恪先生，连同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成为清华大学人文学科四大台柱、四大国宝。可见文凭与水平不见得都等值。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文而化之。有文无‘化’算不得文化。真正的文化是“化合”进入生命灵魂中而并非只是“掺和”在躯体衣冠上。我省云大周边地名就带上了一层抹不掉的文化色彩。北师大教授刘乃和到云大讲学，课余漫步于翠湖、圆通山等云大周围街巷，说，果然是天开文运之地，云大周围街巷名称排列有序，大意味；循着“先生坡”——学不可无师；通过“文化巷”——文化塑人；进入大学中——琢玉成千材；跨出云大门，直上“青云街”，一路踏青云；攀登“大兴坡”；兴盛抵巅顶，可臻“圆通”界（“圆通”是佛家谓觉悟、功德的最高境界）；步出“圆通街”，入眼“青年路”，当是寓成就于青年，寄希望于未来耳！

刘先生将云南大学周围街巷名贯串一气，是学府辉映下这些街巷名本来就隐含某种文化内涵，抑或是教授先生的文化眼光使旧街故里之名得以“点石成金”？有兴趣的人，不妨循以上街巷作一翻考巡，也许还会有更精妙的体悟。这是在追求人文精神的“化”的某种境界吧。一个大学生，算个文化人吧，文化并不体现在校徽和眼镜上，文化就体现在你优雅得体的谈话中，文化就体现在你含蓄内敛的气度上，文化就体现在你雍容宽厚的胸襟里，文化就体现在你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内……总之，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吧！

文化和文明紧紧相连。文明就是节制，节制就不好过。俗话说：“活人被尿憋死了”，仔细一想，被尿憋死的人绝对是文明人，野蛮人才不会被尿憋死呢！野蛮人随地大小便，“潇洒”得很。文明人则行为有规矩，拉屎拉尿有场所，非厕所不能方便，否则宁可“憋死”而绝不在公共场所恣意“潇洒”。憋，就是难过，就是文明，文化又不等同于文明，不是有了文化就具备了文明。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我们会把自己家里装潢得像宾馆，而把宾馆糟踏得像猪圈；我们知道痰盂放在家里不卫生，而创造出开窗吐痰法；我们从不担心丢弃的废电池会污染土壤水源，因为我们早就懂得喝纯净水；我们知道在公司的班车上要抢先给上司让座，而在公共汽车上就完全不要理会任何人。

从体现上看，可以说文化即细节，见微而知著。有一位司机曾说，他驾驶的大客车，一车欧洲客人乘坐了三天，没丢一片纸屑一个烟蒂在地；我们开学术会议的大学老师们乘坐了两天，车内也还称比较洁净；拉某单位的一车同胞，跑了三个小时的路程，结果整个车厢遍地狼藉，就差没成垃圾箱了。有文化的人相对文明程度是成正比的，文化越高，文明程度越高。我有一个小姨妹，读书在天津，工作在北京，出国在新西兰。这年春节回昆，与我们出去游玩，我们所有食品的包装及废弃物，她都细心地用塑料袋装起来，甚至打倒的饮料，也用卫生纸擦吸干净。这就是人的修养、文化差异的体现，细微处现精神。一个文化人的举止行为，当然体现的是他的文化涵养。佛家说：“一滴水中见真如。”

文化来源于我们的教育。1988年，在世界各国诺贝尔奖得主的巴黎会议上，曾有人问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您在哪所大学学到了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这位白发苍苍的学者的回答大大出乎人们意料：“在幼

儿园”。“在幼儿园能学到什么东西？”“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东西要收整齐，做错事要表示歉意，要观察周围的大自然……”。如果说在幼儿园培养的是一种常识的话，那么在大学培养的就是一种习惯。这里，我想谈一下大学教育。中国的大学，需要更多懂教育，献身于教育事业的管理者；需要更多学识修养高，热爱教育事业的教育者；需要更多素质好，诚心探究高深学问的受教育者。当代的大学生绝不能仅仅成为“知识贫乏”的专业人员；或成为高度功利主义和物化心态的高级职员；或成为自私自利，有碍于群体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或成为麻木不仁、不关心社会问题的消极遁世者。台湾高震东先生对“学生”之本意有一个诠释。他认为，“顾名思义，‘学’就是来求学。学什么呢？答之曰，学‘生’。学什么‘生’；第一就是学‘生活的常识’，第二就是学‘生存的技能’，第三就是学‘生命的意义’，由浅至深，阶段分明。”

在大学值得大家深究的问题是：在思想与金钱、理想与现实，物质与精神之间，到底什么是最有用的？对此，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提出了一个“无中生有”的观点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他有一句话意思是用泥水做成的器皿，以及我们居住的房屋，其壁、底、盖等实体均为器皿或房屋构造之必备条件，只有器皿的中空部分或房屋之门窗等空间才是真正有用的部分，换言之，如无中空部分和门窗等空间，那么器皿和房屋均是无用之物。“故，有之以以为利，无之以以为用。”这一道理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办大学需要人、财、物力，但更需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办学精神和思想。青年人成才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但更需要理想和精神追求。没有精神力量，一切物质基础只会是静止的，只有思想才能使一切现实条件变活，并产生效用。“哀莫大于心死”，没有了精神支柱，任何人都无力面对开创事业的艰难困苦。

由此我们体会到，大学要上课，但上课不是目的，因为时空的局限我们只能选听小部分的课程；要熟记知识，但记忆亦不是目的，因为知识爆炸而无法穷尽之；要学习专业，但掌握专业技巧不是目的，因为技术进步而致岗位要求日新月异。因此，大学教育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包括上课、实验、争辩、交流、考试在内所有要素、环节、手段和环境构成的智力训练体系来形成能伴随培养对象一生的理智的习惯。这种习惯具有自由、公正、平静、温和、智慧的特征。因此，英国神学家、红衣主教、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说，大学中传播的这种知识“不仅仅是一种外表和意外的优势，它是一种所得到的启发，是一种习惯，是个人的所有物，是一种精神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把大学说成是教育的场所而不是教学的场所的原因。”

这样，我们头脑中没能想透的问题：为什么古今中外有那么多的社会精英与大学教育失之交臂？同样又有不计其数的大学毕业生被社会视为眼高手低，只会怨天尤人，甚至连生活都难以自理的人？这些在纽曼的以下精彩演讲中可寻到答案。即：“一方面，大学课程不把它的目的局限于特定的专业，另一方面，它也不培养英雄或激励天才人物。真正天才人物的著作不受写作技巧的影响，英雄的头脑不受规则的支配。大学训练是达到一种伟大而又平凡的目的的伟大而又平凡的手段，它旨在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提高公众的智力修养，纯洁国民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大众的志向提供确定的目标，扩展时代的思想内容并使这样思想处于清醒的状态，推进政治权力的运用以及使个人生活之间的交往文雅化。”

“这种教育使人对自己的意见和判断能有一种清醒而自觉的认识，能用真理去发展它们，能雄辩地说明它们以及能有力地提倡它们。”

“这种教育使他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抓住要点，理清思想头绪，发现强词夺理的东西，抛弃无关的东西。”

“这种教育使他准备去胜任任何职务，去精通任何一门学科。”

“这种教育告诉他如何去适应别人，如何去了解别人的思想，如何在别人面前显露自己的思想，如何影响别人，如何与别人达成谅解，如何宽容别人。”

“他能够在任何社会安身，他与各个阶级都有共同的话题，他知道何时表达自己的思想，何时保持沉默。他能够与人交谈，也能够倾听别人的意见。”

这里，我做一个小结：我们常说，自然科学回答“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而人文科学则回答“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做”的问题。自然科学的本质是求“真”的，而人文科学的本质是求“善”的，求真需要以求善为导向，而求善则需要以求真为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纽曼对大学的精神已经论述得很透彻了，我这里只谈大学的人文精神。大学人文精神主要是指大学所弘扬的在处理人与自身、与他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所持有的正确的价值观，以及建立在这种价值观上的行为规范。大学人文精神是大学文化教育的核心，是大学的灵魂所在。一所大学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人文精神。大学要弘扬自己的人文精神，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培植校风，即营造一个浓厚的人文环境。人文教育更多的是靠潜移默化的熏陶，不是耳提面命的说教。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把校园建成一个“大染缸”，让学生置身其中，耳濡目染，受到良好的人文教育。我们学校开展的校园文化节活动，诸如“青年论坛”，“校园诗歌朗诵会”，专题演讲赛以及众多的读书社、爱心社、科技节等活动，都为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途径。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文化人这个概念。什么是文化人？文化人相似于“知识分子”的含意。我们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中专以上文化程度者”，是以文凭作判定尺度的。

纽曼曾经告诫我们，“你们必须驾驭你们的知识，而不是让它们压迫你们，否则它们就会使你们窒息。你们的知识越多，负担也就越重。”所以常人包括我在内，也最容易把知识分子理解为——无非是进过考场、啃过书本、诵读经书、牢记规矩、遵循教条、自以为“知识”比别人多的一个“分子”而已。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如若染上“受宠若惊”的习性而不能恪守“宠辱不惊”的大道，则难免在知识越来越多的同时离真理越来越远。如此分析，就不难理解这一群体几千年来被“御用”的命运和被世人爱称为“小知识分子”的原因。

知识分子的自救，必须从对知识价值的认识开始；大学的自救，必须从对大学精神和理想的把握开始。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以为掌握了“政策”就吃透了“精神”，熟记了“知识符号”就占有了“知识本身”。我们忽视了“政策”之上的精神和“符号”之内的知识。于是乎，今天中国的教育体制就生产出许多的“厅局级领导”而非教育家，生产出许多的“科处级干部”而非教育管理者，生产出许多知识复述人和五年一晋级的讲师教授而非痴求真理的老师，生产出许多择职业而非选志向、求文凭胜于求致理学子。

我们不妨看看法国人是如何定义“知识分子”的。他们认为知识分子的最大特征是具有“心灵的自由度”，这是从人文内涵上对知识分子作判定。心灵的自由度包括三个方面：1、独立的人格，即有头脑，有见地，不趋炎附势鹦鹉学舌，不亦步亦趋人云亦云。2、批判的意识，即辩证的思维，弃糟取精善于扬弃，

不走极端，避免片面，敢思考，善思索。这里我想起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韩国企业的女老板，在我国因为不断地让工人加班加点，一位老工人实在熬不住了，他瞌睡了，女老板竟然要这位老工人给她下跪。老工人跪下了，其它的工人提出抗议！这个女老板，竟要所有抗拒的人都跪下，一个车间的人都跪下了。没有跪下的只有一个青年，他说：“我是中国人，我决不能在你们面前跪下！我可以失业，但是我的膝盖从1949年就站起来了！”讲这个故事的人慷慨激昂，听这个故事的人热血沸腾，写这个故事的人充满激愤，被鼓动起来的人们要送这个青年“民族英雄”的牌匾，韩国女老板则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因为翻开我们民族历史上可悲的一页，有类似的场景，触动了我们民族屈辱的神经。但只要了解韩国人生活习惯的人就会知道，韩国人做错了事就要道歉，就要低头，严重的一定要跪下诚恳的致歉。一件因两个民族互不了解而造成事情就被这样被无端地扩大了，夸张了，上升到了民族尊严问题。对这件事，即使过了多年，仍没有人站出来公正地说话，今天我是第一个说的。所以说，不能人云亦云，凡事都要有自己的思考，这样才能叫做不走极端。3、创新的精神，即勇于开拓进取，敢别出心裁独辟蹊径，能埋头苦干不辞艰辛，尚实干，善钻研。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敢立志创新的文人不是真的知识分子。

美国人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很简洁，是以人道情怀作判定尺度的核心：知识载体，社会良心，八个字而已。爱因斯坦说：一个不在反对核武器扩散的条约上签字的科学家，算不得真正的知识分子。居然认为不具备人道情怀与博爱精神的科学家，就不具有作为真正“知识分子”的资格。所以，在这里，我要和大家共勉的是：

没有独立人格的文人是知识痞子；没有批判意识的文人是知识贩子；没有创新意识的文人是知识呆子；没有人道情怀的文人是知识骗子；而只有文凭不具水平的文人充其量只能算识字分子。

结论：通过以上的探讨，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现代社会呼唤现代青年，而现代青年又必须在知识、能力与素质上求得最大的辩证统一。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一、没有知识就没有人类的进步，但知识就是力量是有条件的。知识决不等于力量，只是力量的必要条件；只有加上能力，知识才能成为力量；二、有知识、有能力，决不等于力量能够充分而正确地发挥。我们只一味追求培养学生有渊博的知识与强的能力，而忽视高的素质的话，后果如何，很难想象；三、素质非常重要。素质是经过千锤百炼、日积月累而形成的，素质又是长期地、决定性地起作用。素质是内因，内因是事物起作用的依据。我们所强调的素质，主要指思想道德素质，是做人，是爱国。因此，高校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高层次人才，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爱国，爱我们的中国，爱我们的中华民族，这属于德方面的素质；二是要能自我发展，要能创新，这属于智方面的素质。培养的人不爱国，办大学可说是彻底失败，而且还起反作用；培养的人不能创新，办大学也不能算成功。21850

参考资料：

1、高旗等主编 《春秋之鸣》——东陆演讲录第四辑之金子强、高旗讲座 《现代社会与现代人》 云南大学出版社。

2、董云川著 《找回大学精神》的部分篇章 云南大学出版社。

3、解思忠著 《国民素质演讲录》之《大学教育的缺失》 上海科学院出版社。

4、王冀生著 《现代大学文化学》之《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 北京大学出版社。

[党课辅导]

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3月26日 7:30—9:30, 多媒体教室,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最近, 在学生当中听到这样一种说法, 说: “某某同学连优秀学生, 优秀团员都不是, 现在却要入党了, 是不是党员的标准降低了?” 无独有偶, 在工作中与群众聊天, 也听到这样的说法, 讲: “某某某同志入党了, 群众非常高兴, 因为他的入党使群众队伍更加纯洁了。”这些引起了我的思考, 而在调查中我了解到青年学生也迫切需要解答以下问题: 共产党员的标准有哪些? 不同历史时期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意义是什么? 如何看待党内及党员中存在的腐败现象? 面对青年政治信仰的多元化, 为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 我们应该如何迎接挑战? 怎样才能成为一名被群众认可的共产党员?

针对这些问题, 我着重参阅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读本》, 《使命》这两本书, 并结合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体验、感悟及思考, 来谈谈我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及看法, 看是否能够解答青年关心的这些问题。

一、共产党员的标准有哪些?

重温我们党的领袖们对共产党员的有关论述, 虽然受历史的局限, 但在共产党员的标准上是几乎一致的。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 “按照党章的规定, 只要承认党纲、党章, 交纳党费, 并且在党的一个组织内担负一定工作的人, 就可以成为党员。”作为一名积极申请入党的同志,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但要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这些还不够。刘少奇同志还说: “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 不应该只是做一名起码的、够格的党员, 而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力求进步, 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 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品质, 作为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

陈云同志也在《怎样做一名共产党员》一文中提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应该是: 第一, 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 第二, 革命地利益高于一切; 第三, 遵守党的纪律, 严守党的秘密; 第四, 百折不挠的执行决议; 第五, 群众模范; 第六, 学习; 他认为, “只有具备了以上六个条件, 才不愧称为一个良好的共产党员, 才不致玷污了这伟大而光荣的党员的称号。”

早在1939年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谢觉哉同志就全面阐述了“怎样做个好的共产党员”, 其中谈到一个好共产党员的八个标准, 并对每条标准作了详尽解释, 今天看来这些仍是一种尺度, 仍是新时期一名共产党员追求的目标。限于篇幅, 我重述一下谢老所谈的第六条: 党员的道德。针对国民党反动派骂共产党“不要父母”、“不要家庭”、“共产共妻”、“杀人放火”、“不择手段”、“不讲信誉”等有意中伤, 恶意诽谤, 谢老认为中国共产党员是最有道德者, 是中国共产党批判的继承了、发扬了中国传统道德的优良方面, 而抛弃了那些为剥削阶级利用的狭隘、欺骗、软弱的东西, 把中国历来尊重的忠孝节义信廉仁勇的好的方面, 发扬到空前未有的地步。因此, 共产党员的道德是: 1, 终身献身于无产阶级的事业, 英勇、坚决、牺牲; 2, 对党无限忠诚, 不说一句假话; 3, 永远站在被压迫者的方面, 对同志、工人阶级、被压迫者, 具有极高的友爱和同情心; 4, 对敌人应无情——对敌人饶恕就是对革命的摧残。同志间热烘烘, 对敌人冷冰冰; 5,